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大智慧研究纲要

王 东

(北京大学 哲学系, 北京 100871)

[作者简介] 王 东(1948-),男,北京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摘 要] 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在深厚的实践基础之上还有三个思想源头。邓小平理论主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含着彻底突破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七大理论创新: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年代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论;社会主义本质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一体两翼的现代化起飞论;“一国两制”、和平统一论。邓小平理论的深层底蕴是一种富于时代精神与中华神韵的大智慧,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系列新的重要生长点。

[关键词] 邓小平;理论来源;理论创新;哲学智慧

[中图分类号] B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6)03-0263-08

邓小平理论的来源是什么,最大创新是什么,哲学基础是什么?正确回答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在当前形势下更好地理解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与精神实质。

一、邓小平理论的三大思想源头

邓小平理论的形成,首先有特别深厚的实践基础,在此基础上还有源远流长的理论来源。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当代世界尤其是发达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与哲学智慧——邓小平理论正是这三大源头活水的综合创新。

邓小平理论最直接、最主要的思想源头,首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这种关系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上:第一,是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思想精髓的继承关系。第二,是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继承关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重视发展生产力、把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等重大原则问题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不可割裂的思想血缘关系。第三,是邓小平理论对晚年马克思新思想的继承关系,特别是晚年马克思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二重性的新思想和东方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新道路,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源头。在这一方面,邓小平本人没有直接讲到过,所以今天需要我们更深入、更具体地做些思想发掘工作。

人们通常认为,在“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只提出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样一种道路。但另一方面的历史真实是,晚年马克思试图探索一条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和东方走向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一条利用世界市场以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特殊道路。对这些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的东方国家来说,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性难题就是:如何一方面跨越资

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卡夫丁峡谷”，另一方面又吸取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

马克思 1881 年给俄国著名女革命家查苏利奇复信时，之所以不厌其详，三易其稿，是因为在“俄国怎样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乃至在“怎样搞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上，都酝酿着一场重大的理论突破：俄国等东方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可能会迥然不同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路，具有内外两大经济特征。这条新道路的外部经济特征，是充分利用世界市场的联系，以便吸取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性文明成果：“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在一起”^[1]（第 444 页），“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1]（第 445-436 页）

这条新道路的内部经济特征，则是利用现代发达的商品交换机构，根本打破农村公社缺少联系的孤立性：“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股份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在自己这里建立起来呢？俄国的‘农业公社’有一个特征，这个特征是它的软弱性的根源，而且对它的各方面都不利。这就是它的孤立性，公社与公社之间的生活缺乏联系，而保持这种与世隔绝的小天地，并不到处都是这种类型的公社的内在特征。”^[1]（第 436 页）由于时代与国情的接近，列宁主义，其中包括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列宁主义基本问题、特别是列宁后期新经济政策的基本思路，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更切近的理论来源。

正是列宁晚年最后提出的新经济政策，成为邓小平理论、尤其是改革开放新思路的直接思想源头。列宁后期提出的新经济政策的新思路主要包含六个新方面：

（一）社会主义本质观。列宁深入到社会经济运行机制的更深层次来具体分析“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本质”。从《国家与革命》到新经济政策之前，列宁的基本观念是：社会主义＝大工厂；而转向新经济政策时期之后，列宁的新观念是：社会主义＝大合作社。后者是一个“五有世界”——有商品形态，有货币流通，有市场体系中介，有各个企业单位的独立产权和所有制，有各个企业单位的独立自主权，和前者有根本区别。

（二）社会主义重心观。列宁原来把社会主义的重心放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上面。“十月革命”后，在工作重心转移问题上，列宁先后迈出了两大步：第一步是在 1918 年春天，他提出要把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夺取政权转向搞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第二步是在他生命最后时刻的 1923 年，他要求把工作重心转向文化建设、“文化主义”。

（三）商品市场观。列宁前期基本上是恪守马克思前期思想，强调社会主义与商品市场的根本对立。从 1921 年新经济政策开始，他逐步形成了新的商品市场观：在俄国落后的特殊国情下，承认走向社会主义与利用商品市场的相容性，主张利用“国家调节下的市场”作为主要中介环节，迂回、渐进、间接地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据此，列宁提出了一个孕育着新观念的新命题：“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2]（第 265 页）开始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可能性、必要性。

（四）资本主义观。列宁原来特别强调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对立性、超越性、优越性。后来，他在实践中发现，对于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落后俄国来说，必须善于利用国家资本主义作为中介环节和得力帮手，把主要是前资本主义的经济文化成分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对国际资本，他主张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租让制，引进外资、技术，利用发达资本主义之手，来建设俄国社会主义。对国内，他主张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特殊政策，把私人资本主义成分纳入到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上来，以利于超越前资本主义的、小生产的落后生产力。

（五）全盘改革观。1921 年，列宁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开始实行经济改革。在 1923 年的最后时刻，他又提出了与新经济政策配套的“新政治政策”和“新文化政策”，要求实行相应的政治改革和文化革命，他自己称之为“必须实行全盘的改革”的总计划。这个全盘改革计划，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总体构想。“新型商品经济、新型民主政治、新型精神文明”^[3]（第 231 页）的三位一体，同步建构，是

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六)可控改革观。当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改革趋势已经不可逆转之时,列宁及时地提出了“停止退却”、设置警戒线的新问题。他指出:“这个新经济政策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包含着许许多多的危险”^[3](第231页),“必须善于克服新经济政策的一切消极面,使之缩小到最低限度。”^[3](第301页)这种警戒线主要是四道:经济上的合作制;外贸上的国家垄断制;政治上的人民监督,防止官僚腐败;文化上的文化革命。

上述六个新观念,支撑起一条新经济政策的新思路: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小农国家里,只能利用“国家调节下的市场+国家资本主义+合作制”作为中介环节和中介系统,迂回、渐进、间接地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这正是邓小平首倡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源头。

毛泽东思想是邓小平理论最直接、最主要的理论来源。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过程中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两次飞跃,二者之间具有不可割裂的历史渊源关系和思想渊源关系。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特别是实事求是的实践观,更是邓小平理论思想精髓的主要理论来源。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八大”前后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些有益探索和晚年的重大失误,从正反两方面为邓小平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做出了必不可少的历史铺垫。“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链条,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思想主流,同时也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主要理论来源。

邓小平理论还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博大胸襟,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西方现代化理论,尤其是其中包含的六大历史经验:第一,把推进现代化作为振兴中华的历史必由之路。第二,以科技革命为火车头推动近代工业化。第三,以现代科技革命、信息革命为动力,带动全球生产力革命。第四,借助相互开放的国际化、全球化趋势推动现代化起飞,坚决打破闭关锁国的封闭状态。第五,坚持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与计划两种手段双管齐下,从根本上突破传统计划经济的苏联僵化模式。第六,充分利用股份制形式与金融市场,探索开放金融市场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哲学智慧,则是邓小平理论不可忽视的又一思想源头。邓小平理论的哲学精髓,尤其是“实事求是”这个提法,就是来自于儒家开创的中国古典哲学中的唯物论传统;邓小平反复强调的“照辩证法办事”的基本原则,在相当程度上正是老子“道法自然”思想的现代升华;邓小平首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论,正是中国历史上富国富民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用“小康”来表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目标,更是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社会理想;在苏东剧变之后,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不要当头”的妙计方略,正是中国古典辩证法和哲学智慧的弘扬;1992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不仅倡导解放思想、重新认识社会主义,而且还提出了重新认识孔夫子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问题:“家庭是个好东西,都搞集体性质的会带来社会问题。如养老问题,现在老年人多了,光靠社会不行,可以让家庭消化。”“中国文化从孔夫子就提倡赡养老人。孔夫子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社会上要讲修身、修养、持家,既修身又持家,就能治国平天下。”“我们不能学国外搞福利社会……我们不能走这条路,还是孔夫子说过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道理。”^[4](第500-501页)

可见,邓小平理论主要立足于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集中体现了中、西、马三大思想源头的综合创新。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七大理论创新

邓小平首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突破了传统的苏联模式,实现了七个重大的理论创新。

(一)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论。从马克思到列宁、毛泽东,他们都曾经长期生活在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历史时代中,当时所创造的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体制,主要地也服从于这种历史时代的

要求。新的时代,使一个历史性难题凸现出来:如何根据世界形势的崭新变化,来探寻适合新时代、新国情的社会主义具体体制,从而使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历史地具体地发挥优越性,达到发展生产力、强化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的根本目标。对此,邓小平高瞻远瞩,对世界潮流的走向作了崭新概括,把“和平与发展”作为当今时代的主题,扬弃了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论。这种富于求实创新精神的新时代论,为社会主义的模式转换论、新型体制论、改革开放论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 50 年,中国这样一个原先相当落后的东方大国,通过新民主主义这座独特的历史桥梁,走上了社会主义建设之路。这就必须要独立地分析中国国情,真正把握中国的特殊性。毛泽东为科学分析中国国情奠定了最初的基础,但晚年却偏向了“左”的错误。因此,解决这个时代难题,具体分析中国特殊国情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在了邓小平肩上。他提出的当代中国特殊国情论、主要矛盾论、特殊矛盾论,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为主题,为改革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解放发展生产力与共同富裕统一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为了更好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的深层理论问题,邓小平依据世界历史一般趋势,再结合中国特殊国情,对社会主义本质做出了一个独具特色的理论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5](第 373 页)这五句话是两个基本点的统一:一是生产力;二是共同富裕。

(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论。中国是一个原先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东方国家,没有经过充分完整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因此面临的一个最大历史难题就是:如何从前资本主义起点出发,既避免资本主义发展前景,又吸取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对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探索出来的新道路是:对内改革,以打破国家垄断,利用市场机制焕发经济活力;对外开放,利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智力、管理技巧,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时,邓小平提出,把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相互支撑的两个基本点,从而保证中国改革渐进、可控、稳健,防止某些国家出现的大曲折、大动乱。

(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两个流行多年的教条主义公式。虽然马克思晚年提出过,落后俄国应利用世界市场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新构思,列宁后期的新经济政策也提出了利用“国家调节下的市场”迂回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思路,但是这些闪光思想后来全被历史湮没了。而邓小平却基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对比东西方现代化的普遍规律,以超越前人的理论勇气,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两个新命题、新论断:“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5](第 373 页)这个新论断的提出,如石破天惊,有力冲击了教条主义僵化观念,意味着对社会主义的崭新理解。

(六)一体两翼的现代化起飞论。在当代社会主义体制改革中,经济体制改革是重点,政治体制改革是难点。当代社会主义的大曲折,深层原因固然是经济改革、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没搞上去,但是直接的失足点、触发点、爆炸点,却往往发生在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上。

如何化解这个大难题,又避免大动荡?邓小平以他高超过人的政治智慧、历史智慧,提出了一条新思路:既不采取“直接碰”的激进方式,也不采取“绕着走”的消极方式,而是采取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导、“引着走”的稳健方式。在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起点上,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为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总体构想。80 年代后期,他又提出了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同步发展的基本思想。90 年代初,他进而提出,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点,配套建构新型民主政治、法治国家。邓小平要求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一种新型文明形态,采取“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方针,并走向“新型市场经济——新型民主政治——新型精神文明”的整体建构,靠这种一体两翼式的体制创新,支撑中国现代化走向有决定意义的起飞阶段。

(七)“一国两制”和平统一论。既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国家统一,而又避免大的战乱,是一个历史性的

大难题。为解决这个历史难题,邓小平以他特有的大智慧,指明了一条切实可行的双赢之道:“一国两制”,和平统一。香港、澳门的回归,已经证实了这一思想的有效性。创造性地解决台湾问题,也是指日可待。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大智慧

邓小平理论的深层底蕴,是富于时代精神与中国神韵的哲学大智慧、新智慧,其中较重要的是十六个要点:

(一)主客统一的世界观。邓小平特别强调,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为了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必须以解放思想为前提,突破传统计划经济的僵化模式和“左”的教条主义僵化观念束缚。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统一的,解放思想的最终目标,就是摆脱各种本本主义、僵化观念的桎梏,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实质上体现了主体性与客观性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原则,体现了劳动实践活动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双重尺度统一的根本原则。

(二)知行统一的实践观。邓小平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在这个统一过程中,应当充分肯定实践的作用是第一位的、决定性的,是认识形成的基础,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认识发展的动力,是认识过程的归宿。尤其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在“改革是第二次革命”的前无古人的崭新实践中,不能靠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必须大胆实践,大胆试验,大胆探索,大胆创新。要以解放思想的理论创新作为实践创新的先导,更要以大胆的实践创新作为理论创新的火车头和动力源。

(三)虚实统一的唯物史观。针对脱离生产力谈论社会主义、脱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大搞“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唯心主义倾向,邓小平首先强调的是把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彻底地贯彻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以现代化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奠定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当务之急。但是,不能把邓小平理论简单归结为片面狭隘的经济主义、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也要防止单打一式地只抓经济,造成一手软、一手硬;要务实与务虚、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两手一起抓,两个文明一齐上,才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体制,要按照“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战略布局展开,形成“一体两翼”式的总体结构: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体,逐步展开“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之两翼。

(四)共殊统一的特色观。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概念、基本范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这里,中国特色是个性、个别、特殊性,社会主义是共性、一般、普遍性,二者合起来构成一个统一概念,体现了个性与共性、个别与一般、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对立统一,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对立统一。邓小平要求在个别与一般的对立统一之中重点把握个别的特殊性、复杂性、丰富性。

(五)对立统一的矛盾观。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而对立统一规律的核心则是矛盾斗争性与矛盾同一性的关系问题。在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历史时代,从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都强调矛盾诸方面既对立又统一,由此推动事物的发展,而重点都在于强调矛盾斗争性的绝对性、矛盾同一性的相对性。“左”的教条主义将这一点僵化、绝对化、教条化,以至于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简单归结为“斗争哲学”。邓小平立足于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新时代,针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在承认矛盾斗争性的前提下,更加强调矛盾斗争性与同一性关系的新特点,更加强调寻求对立面的和谐结合,更加注重探寻对立统一的中介环节,更加注重如何推动矛盾统一体诸方面的共同发展。这就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超越了单纯的“斗争哲学”和“和平哲学”,成为以必要的斗争性为前提手段、而以和谐发展价值目标的现代新型哲学,集中反映了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精神。

(六)名实统一的社会主义观。邓小平理论要求从理论思维的高度,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首要的基本的问题,实质上是要求从哲学高度,唯物辩证地解决社会主义观念中的名实关系问题、科学概念与客观实际的关系问题。他反对割足适履地“以名裁实”、本本主义地抽象谈论

社会主义。他要求以实正名、制履适足,根据中国不发达的实际国情,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概念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反过来,再循名求实,足履统一,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概念和基本路线,规范、指导具体工作、具体实践。他要求从实际出发,按照“三个有利于”标准,为改革开放及其指导思想正名,名实统一地充分肯定中国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姓“社”不姓“资”。

(七)与稳定、发展相统一的改革观。对于邓小平的改革观,不能像海内外的流行说法那样,简单归结为渐进改革观。他要求体现改革目标与改革途径的辩证统一:中国改革的最终目标,强调的是彻底性、根本性、系统性、全面性,绝不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国家的改革那样,只是枝枝节节、小修小补;中国改革的具体途径,要求循序渐进、稳健可控、不失时机、重点突破、整体推进;中国改革的阶段目标,则要求体现“稳定前提、改革动力、发展目标”的协调一致,把“稳定的程度、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历史地、具体地统一在一起。

(八)台阶式与持续性统一的全面发展观。邓小平特别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才是压倒一切的最高目标。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要以经济发展为坚实可靠的物质技术基础,在此基础上寻求社会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没有经济发展作为物质基础,社会发展就成了空中楼阁;没有社会全面发展作为保证,经济发展就难以持续。发展不可能总是四平八稳、匀速直线运动,要抓住时机,加快发展,实现跳跃式、台阶式、飞跃式的发展,过几年上一个台阶。要保持发展的可持续,要在 10 年、20 年、30 年间,持续上几个台阶,实现现代化经济起飞。由此,区分了发展的两种质态:一种是数量增长的渐进式发展;一种是经济结构与生产力形态发生革命的飞跃式发展。发展模式也有两种:非持续性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九)必然性与偶然性统一的机遇观。邓小平把历史机遇问题,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上来。“抓住时机,发展自己”,成了首当其冲的历史任务。历史机遇既不是通常所说的单纯的必然性和决定论,也不是通常所说的单纯的偶然性和非决定论,而是必然性与偶然性对立统一的或然性和概率论。历史机遇是以历史必然性为基础,再加上众多偶然性因素,巧妙综合到一起而构成的。能不能抓住机遇,一看客观条件,二看主观努力。中国历史发展中,失掉了几次大的机遇;而这一次遇上的,是百年不遇、千载难逢的大机遇。要抓住大机遇,实现大发展。能否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决定着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

(十)渐进性与革命性统一的生产力观。邓小平理论特别突出了“生产力革命”这个概念,并认为这是整个社会有机体发展中最根本的革命。由此区分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两种形态:一种是常规时期、数量增长的渐进式发展;另一种是生产力质态发生飞跃式变革的生产力革命。现代科技革命时代的特点,恰恰在于科学技术成了第一生产力,由此带动并形成了现代全球性的生产力革命。当代社会主义,尤其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是我们的中心任务和当务之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把生产力从传统计划经济的苏联僵化模式下解放出来,这正是“改革是第二次革命”的深刻含义。我们搞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应当首先用这个尺度衡量一切工作的是非得失。

(十一)与科技革命时代统一的科技观。科学技术发展有两种质态:一种是数量积累的常规渐进式发展;另一种是大变革、大发展的科技革命时代。从世界历史发展来看,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这不是个别科技领域的局部改革、渐进增长,而是整个科学技术领域的大变革、大发展、大飞跃。只有紧紧抓住现代科技革命的时代大潮,社会主义才有希望,振兴中华才有希望,中国现代化才有希望。要把科技现代化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关键与先行,借鉴美日等国历史经验,走科教兴国之道。要把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把科技发展与经济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才能实现现代化起飞。在科技革命时代,发展模式、发展战略要做相应的重大变革,像传统模式、传统战略那样,单纯靠人力投入、资源投入,只能是爬行式发展;只有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才能实现现代化起飞的飞跃式发展。中国必须在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上,占有一席之地,才能在 21 世纪实现振兴中华

的伟大使命。

(十二)综合与创新统一的文化观。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中的古今中外化、新民主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文化方针,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综合创新文化观。走“古今中外,综合创新”的大道,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文明。这就要求把中华民族母体文化的活东西,西方近现代文化中的新东西,社会主义主体文化中的好东西,全都熔为一炉,创造出富于时代精神与民族特色的新型文化。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第一次明确举起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旗帜,同时也举起了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爱国主义的思想旗帜。他要求对中国传统文化作一分为二的具体分析,分清作为民族精神的活东西与封建主义的死东西。对西方近现代文化,也要以唯物史观为哲学工具,作一分为二的具体分析,广泛借鉴一切有益于现代化、社会化的文明成果,摒弃一切腐朽的东西。

(十三)义利统一的价值观。邓小平理论在哲学观点上的一大特点,是把思想重心从方法论转向价值观,更确切地说是转向辩证法与价值观的统一。邓小平价值观上的显著特征,是提出“三个有利于”的价值标准论,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衡量改革开放、各项方针政策以及各项工作利弊得失的主要价值标准。“三个有利于”的思想实质,就是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物质技术基础,达到富国富民的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这和社会主义本质论是完全一致的。“三个有利于”的本质特征,是义利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针对“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需要,特别强调功利当先,义在其中,义利统一,不可割裂。这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型体制相适应的义利统一的新型价值观,它既根本摒弃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重义轻利的姓“社”姓“资”惟一价值标准论,也根本超越了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重利轻义的单纯功利主义价值观。

(十四)中外统一的世界史观。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提出了“现代化”这个有哲学意味、理论高度和闪光智慧的重要范畴,启迪我们从三个层面的统一之中,来把握全球化的时代大潮:最深层的是劳动社会化;中介层的是交往普遍化;最表层的是信息网络化、市场全球化、世界整体化。这就要求我们从“中国与世界”的统一之中来把握中外关系: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多极的世界离不开中国。为此,中国必须采取“三个面向”的战略方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对外开放、全面开放、努力汲取世界文明的一切成果,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必由之路。“封闭必然落后,落后必然挨打”的老路,决不能再走下去了!在对外开放性与民族主体性、争取外援与自力更生之间,必须寻求对立面对和谐统一的恰当尺度。邓小平对外开放论的智慧在世界历史上独树一帜,既超越了斯大林的两个世界市场平行论和脱钩论的孤立封闭主义,也超越了依附论、世界体系论的西方中心主义。

(十五)人我统一的互主体性观。西方文明,尤其是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核心观念,是个人本位、自我中心的单主体性观,这表现在他们的人权观念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也表现在他们处理国与国的国际关系中。而中华智慧的显著特点,从孔子的“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墨子的“交相利,兼相爱”,一直到“大同世界”的民族理想,都强调的是多极世界、多元主体的互主体性观。邓小平的哲学智慧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更高、更新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现代新型的互主体性观,以平等互助、共同发展为其本质特征。在国内关系上,强调组成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团结起来,振兴中华,互助互利,共同富裕;在中国大陆与香港、澳门、台湾的关系上,强调“一国两制”,和平统一,不是你吃掉我、我吃掉你,而是在保证国家统一的前提下长期共存、共同发展;在国际关系上,强调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搁置争端,共同发展。

(十六)分合统一的大系统观。作为一位胸襟开阔、站得高看得远的大战略家,邓小平最为强调两大哲学观念——实事求是观和照顾全局观:“照顾全局,从实际出发,这两个观点缺一不可”^[9](第198页)。“最重要的问题是要胸襟开阔。要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5](第300页)他反复强调讲大局、讲全局、讲战略布局、讲系统改革,实际上贯穿了一个核心观念,就是复杂

开放、分合统一的大系统观。简而言之,这种大系统观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系统分析方法,即把复杂的系统整体,分成诸多层次、诸多要素,注意把握贯穿其中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二是系统综合方法,即把诸多层次、诸多要素再综合起来,把握住复杂系统的整体性、全局性、总体性。邓小平的大局观、大系统观,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思维方式的东方神韵与 20 世纪后期现代科技革命的时代精神。

从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十一条、列宁《辩证法要素》十六条、毛泽东四篇主要哲学著作,到邓小平具体辩证法、实践辩证法的十六个要点,既体现了一脉相承的继承关系,又反映出历史的发展、科技革命的发展、时代精神的发展、哲学智慧的发展。

邓小平哲学智慧的思想主线和骨骼系统,是“新实践观、新唯物史观、新矛盾观、新发展观、新全球史观、新价值观”六块基石,其中贯穿一个精髓——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统一的根本原则,这是邓小平理论的新的哲学基础,由此开创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的新境界。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当代的重要生长点。

[参 考 文 献]

- [1] [德]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 [2] [俄] 列 宁. 列宁全集:第 4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 [3] [俄] 列 宁. 列宁全集:第 4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 [4] 中央文献研究室. 回忆邓小平:下卷[C].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 [5]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6]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 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 严 真)

Research Scheme of Great Wisdom in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WANG Dong

(School of Philosoph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Biography: WANG Dong (1948-), male, Professor, Doctoral supervisor, School of Philosophy, Peking University, majoring in Marxist philosophy.

Abstract: DENG Xiaoping Theory originates in practice and has three ideological sources. The theme of DENG Xiaoping Theory is the theor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it includes seven thoretical innovations which break through the theory of Soviet Socialism completely. The seven thoretical innovations are as follows: Theory of times with the theme of peace and development; Theory of Chinese national condition of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Theory of socialism essence; Theory of integrating the reform and the open policy with the Four Cardinal Principles; Theory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heory of economy take-off; Theory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Theory of Peace and Unification. The deep connotation of DENG Xiaoping Theory is a kind of wisdom which is featured with spirit of times and Chinese verve, including a series of important growing points for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philosophy.

Key words: DENG Xiaoping; theoretical sourc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philosophical wisdom